

常州文史資料卷

要 目

姜椿芳傳

江南詞人謝玉岑

我的父親李子寬

常州近現代部分歷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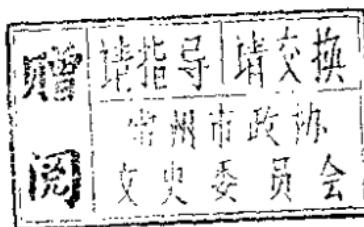
物名录之二

九

89

九/63/17
常州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江苏省常州市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1989.12



1986年姜椿芳向邓小平同志赠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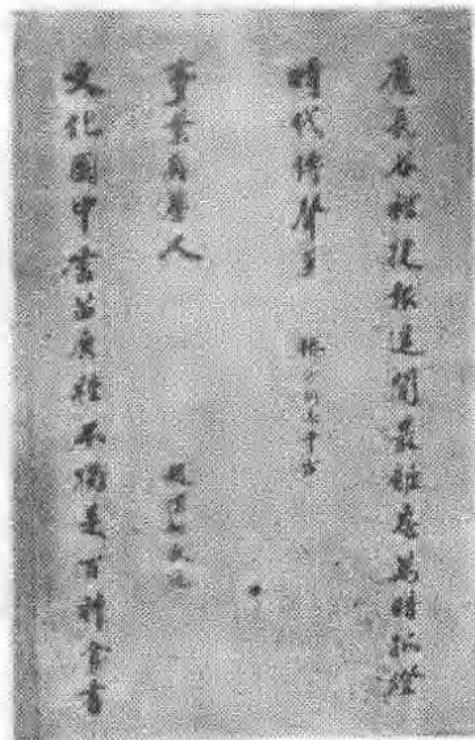
姜椿芳
(1912—1987)



1928年姜椿芳(坐者)离常赴哈尔滨时与礼乐小学同学合影



姜椿芳(左)和中
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委员会委员夏衍交谈



赵朴初 挽联

松風自發曲爭此不須彈
向方具此謹深脫吾有
世歷之微行公苦空個人耶
已未春清明為

予寬正兄 雜屬 菩提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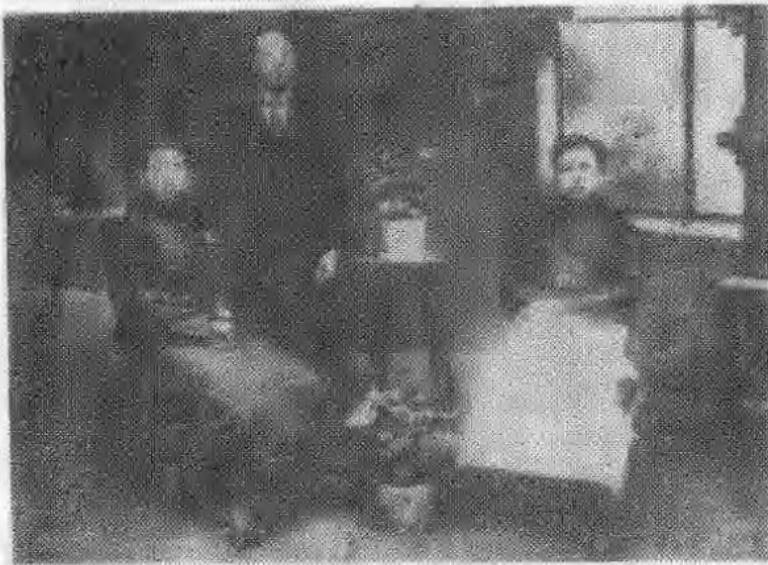
▲瞿秋白贈李子寬書



李子寬

(1898—1982)

▼瞿秋白(中)李子寬(左)等合影



謝玉岑（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在蒙主未深忘前悔長輩舊聲
被時名者多忘私有他優美的
光風拂面時行吟而有詩聲
耀輝高士生詩哲工大疏德門
惠林班門妙教於致重於一進門
否蝶飛河東遺道無所
清音發手無言不私忘待不
能忘忘不妄得之色得之不遺
之全體可方正以人法
乃天道而以陰實而聖道通
此其職也顧顯昂昂

謝玉岑書法各幅

目 录

姜椿芳传	姜 挺 纪恒俊(1)
姜椿芳在东北	王式斌(32)
姜椿芳领导《时代日报》的战斗	陆 治(42)
姜椿芳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于 友(46)
厚今而不薄古的出版家	
——纪念姜椿芳同志	周有光 张允和(53)
在父亲身边的日子里	姜尼娜(57)
悼北京姜椿芳词丈	(新加坡)梁建才(63)
悼念中华诗词学会领导人姜椿芳先生	
.....	(新加坡)廖容观(63)
江南词人谢玉岑	秦渭阳(64)
忆父亲玉岑先生和张大千师的交谊	谢宝树(76)
艺苑九友	
——忆南中教师谢玉岑先生	方子川(80)
记祖父吴中行先生	吴锦成 吴锦渝(82)
名摄影家吴中行先生二三事	穆一龙(86)
回忆吴中行先生	董叔宣(88)
执着地追求真善美	
——忆吴中行先生	陈 莒(91)
我的父亲李子宽	李廷宁(94)

李子宽二三事	张蓬舟(103)
回忆“国闻社”	<u>李子宽</u> (107)
忘年交	
——与董純庵、鄭珩、傳怡三位老一輩黨外 人士交往的片斷回憶	李鎮瀛(113)
清才几欲冠吾州	
——記馬萬里先生	呂學端(120)
筆陣墨池寄精神	
——寫在家父周子青逝世一周年之際	周源(128)
國民革命軍鐵甲車隊司令——蔣必	朱兆京(132)
我的回憶錄	沈沛霖(138)
雜談	
商務印書館與常州同仁	蔣仲麟(154)
常州旅沪同鄉會追記	史肇美(160)
民國期間常州話劇演出活動散記	趙爭金沙(162)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武進縣保安團的演變	
及其活動情況概述	黃元裕(174)
沦陷時期的武進縣商會	蔣克定口述 顧雪雍整理(188)
江蘇省文史館(常州籍及寓常)館員名錄	
常州近現代部分歷史人物名錄之二	李鎮瀛(208)
	陳吉龍(213)

姜椿芳传

董挺 纪恒俊

青少年时期

1912年7月28日，在江苏省武进县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中，出生了一个男孩，给多年盼望有个孩子的父母带来无限喜悦，他们给这个独生子取名姜椿芳，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爷爷叫姜岳安，为人老实，小时在一家小南货店学徒，满师后留下当店员，到了三十多岁时，这个南货店倒闭，他也就失业了，此后几十年一直没有正式职业，直到去世。我奶奶名叫张长生，她的父母很早便去世，她长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身高体强，精明能干。为了生活，她当过渡船的艄工，当过佣人，为妇女梳各种样式的头挣钱，靠着一双勤劳的手，拼死拼活终于把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抚养成人，还为每个弟弟准备了房子，使他们结婚成家，又为妹妹料理出嫁，等一切都安排好之后，她才和我爷爷结婚，当时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

由于爷爷缺少文化，饱受失业的痛苦，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多念些书，长大后能得到个养家活口的职业。为此他们日夜操劳，用微薄的收入送儿子到私塾念了四年古书。1924年春，又把儿子送进一所基督教学校——东吴大学附属第十二小学初小二年级，后来这所学校改名恺乐小学，校长是基督教牧师张海云。父亲小时候的同学袁彦椿后来回忆说：“椿芳性情文雅，极其聪明，记忆力非常好，在班

上门门功课都考第一。椿芳小时候就喜欢同他父亲一起去庙会上看戏，怕看不见，总骑在他父亲的肩上。椿芳会吹箫，喜欢篆刻，写得一手好仿宋体字。椿芳手也很巧，自己会做小家具、小玩具。”父亲的老师刘莘初，在我父亲去世后给我们家写的信中回忆说：“椿芳是六十年前恺乐小学我教的算术班上的学生，每次测验他总是满分，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当时说的一句话：不做时代落伍者。我当时觉得这个学生将来一定有作为，后来他终于成为我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武进县城，革命浪潮激动着青年们的心，我父亲作为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全县的学生会，投入了进步的学生运动。

初到哈尔滨

迁居东北多年的爷爷的大哥回乡探亲，建议把我父亲送到东北哈尔滨去学习俄文，以便将来考进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工作，说那里薪水高，职业牢靠。我爷爷很高兴，立即随他大哥去东北谋生，为将来儿子到东北去创造条件。1928年夏天，父亲小学刚刚毕业，奶奶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卖光，凑了路费，坐轮船，换火车，携带着16岁的父亲，远走千里，来到松花江畔的哈尔滨。为了让父亲早日学好俄文，奶奶忍痛把自己的几件首饰卖掉，请了一位俄国侨民每天教父亲一小时俄文。这位俄国老师很有学问，但他不会说中国话，只会说些英语，父亲必须在学习俄语之际，依靠在小学所学的一点英语听课，造成双重负担，而且中学的功课又不能不学好，否则就不能寄读下去。几种学习同时并进，父亲感到十分吃力，但面对现实，面对

爷爷奶奶的希望，不拼命不行啊！

爷爷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发生问题，不得不和奶奶一起到下江县去投靠爷爷的大哥，把父亲一个人撂在人地生疏的哈尔滨，父亲感到十分孤独，夜里躺在大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闭目遐想，觉得自己好象孤单一人站在高高的山上，于是他想起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一首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想来想去，他下定决心：要独立奋斗下去，不能害怕，不能退缩，只有迎着困难前进，才能找到出路。

秋天，松花江还没有封冻，我奶奶独自一人乘轮船来到哈尔滨，含着眼泪对父亲说：“我在你伯父家实在住不下去了，天天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实在太难过呀！并且我也太想你了，总是放心不下啊！你爸爸现在到另外一个县里的火磨上给人家管仓库去了，我准备在哈尔滨住下，好照顾你。”奶奶找到一个武进县同乡家中借住下来，为这家人家做饭、管家务，做女仆的工作，但没有工资，供给吃住，父亲星期天也去吃饭，寒假去寄居，这就算代价。对于当时的生活，父亲的感触很深，后来他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街时常常看见马车，在老马身旁，有一匹小马跟着奔跑，决不会离开母马跑到别处去。母马拉着重车，样子很沉着，有时用它那没有表情的眼睛瞧一下小马。老马虽然劳累，但对赶车人似乎并不抱怨，因为赶车人也负担它的小马的生活呀。老马带着小马一起奔跑，与其说是老马在给小马传授自己的劳动经验，不如说是准备移交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给下一代。在人生的不平坦道路上，人类也必须一代一代地肩负起劳动的重担，创造自己的未来世界。”

寒假过后，奶奶拿出她仅余的一点首饰，换了几十元钱，

眼里含着泪水，却装着无所谓的样子，交给父亲去交学费。父亲在学校起早贪黑地拼命读书，并抓紧课余时间读报纸和文艺书籍，从自己受苦受压迫的立场出发，对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世界形势，很自然地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他写诗投寄给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参加了那年冬天全哈尔滨市学生掀起的护路运动，和群众一起游行示威，一起向警察冲去。在学生会里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学生运动的讨论和斗争，父亲的政治意识从朦胧中觉醒了。

1929年放暑假后，爷爷所在的火磨停火，再不能给奶奶寄钱来，生活更加困难，再也负担不起父亲的学费和膳费，父亲只好辍学了。几个邻居是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职员，都通晓俄文，奶奶就去请他们帮助给父亲找个职业。通过熟人的关系，父亲几次前去应考，但都没有被录取，虽然当时父亲还只读过一年俄文，程度不够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每次考试，所有被录取的人都是事先早已内定好的，都是有“门子”的。就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居然来了好消息，一个武进同乡把父亲介绍到中东铁路工务处第八处当办事员，先是做俄文、中文抄写工作，后来当记帐员。由于是硬塞进去的，父亲的工资要分一半给另一个新进去的工作人员。但即便是拿半薪，生活也改善了，奶奶觉得再住在人家家里过意不去，就搬了家。新居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房东是中国印书局的经理，还有一位邻居是政法大学教授。奶奶对父亲说：“你不是要读书吗？这两家的书很多，我去求求人家借来给你读。”于是父亲经常去借书，每天下班后埋头阅读，还请那位教授介绍老师，学习代数、几何等课程。但好景不长，不久因为中苏两国因纠纷，中东铁路局把新进来的职工一律解职，父亲失业了。正在走投无路的

时候，常州恺乐小学校长张海云牧师来哈尔滨传教，他给父亲找到一份工作，为光华通讯社作翻译。当时的哈尔滨是一个国际都市，有三十多万俄侨和将近五十多万中国居民杂居在一起，俄侨出版了多种俄文报刊，光华通讯社要把当地俄文报的消息译成中文，分发给中国报纸刊载。才学了一年多俄语的父亲，工作很有困难，但为了生活，必须勉强去做，遇到俄文中不懂的字句，只有找唯一的老师日本版的《露和辞典》（俄文辞典），但他没有学过日文，查字典也只能一知半解，一篇小文章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译完。每天要译两三千个字，工资是大洋三十元，总算三口之家聊以糊口。

光华通讯社是国民党进步人士刘天佑先生所办，刘天佑有个弟弟叫刘天任，是吉林大学的学生，思想很进步，父亲认识他后，他介绍不少文艺书给父亲看，介绍父亲读《大公报》上的“苏俄视察记”等，使父亲思想上得到很大启发，这时同院的邻居又给父亲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保险公司当收款员。这样父亲上午到保险公司去工作半天，下午到通讯社翻译新闻，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则由爷爷下午去收，从此生活稍为宽裕了。

参加革命

1931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宝山事件，父亲深感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不断增长。暑假中刘天任从吉林回到哈尔滨，介绍父亲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它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父亲的任务是散发传单。为此父亲常常单独外出，回家后又默不出声，爷爷常常问他，他就随便支吾过去了。随着活动的增多，家中来的青年人也增多了，

爷爷奶奶虽然并不盘问父亲什么，但从他们的言语行动中也多少猜出了一些，为了父亲的安全，他们觉得住得隐蔽些好，于是他们又搬了家。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开进了哈尔滨，光华通讯社停办了，保险公司也把父亲解雇了。早些日子，父亲就经常把俄文报的反日活动消息译成中文，向《国际协报》投稿。《国际协报》总编辑王研石先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他知道父亲要靠微少的稿费维持生活，就尽量多采用父亲的译稿，并让父亲到他家当家庭教师，增加一些收入，帮助父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时父亲已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做了不少宣传工作，1932年父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团市委宣传部长。当时的中共市委书记是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团市委书记是吴振庭，组织部长是著名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哥哥赵尚朴。从此父亲的住处便成了团市委的机关，青年团的军事训练班和政治学习班都在那里开班，中央巡视员、上级派来讲课的老师和杨靖宇同志，经常来到那里指导工作，爷爷奶奶则自觉地担负起放哨、望风、接待等工作。爷爷奶奶既是爱护自己的独生儿子，同时他们经历的痛苦遭遇，也使他们同情起革命来。

1932年5月，党派父亲到“英国亚细亚通讯社”当电讯翻译，事前中共省委书记罗登贤找父亲谈话，说今后中苏两党有什么信息，要通过父亲和英亚社内的苏联同志传达，对工作要保持绝对秘密。东北在军阀统治时代，不允许苏联人在东北办报纸和通讯社，苏联人只得通过英美人在东北办报、办通讯社，因为英美人在华有治外法权。英亚社就是由苏联主办、英国人出面经营的，门口还挂一面英国旗做掩护。父亲在这里

工作了四年整，除了负责同第三国际联系之外，还翻译了大量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苏联人民的生活、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新聞，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報道，还有东北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的关內情况的消息。英亚社電讯稿发到整个东北，影响很大。通过工作，父亲的国际知识、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提高多了。父亲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深受党组织的信赖。

父亲担任团省委宣传部长后，负责主编《满州青年》，后又改名为《东北青年报》。不久父亲调到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工作，为了组织的安全，父亲又搬到十一道街的地下室居住。父亲为省委起草宣言，编辑《满洲红旗》，后改名为《东北人民报》。父亲的家成为中共省委机关之一，省委的一些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杨靖宇、李兆麟等领导同志经常住在父亲家，我奶奶便成了省委的秘密交通员。当时父亲还负责管理两个秘密机关——印刷所和发行所。父亲要把编写好的报刊与传单等稿件送到秘密印刷所，在那里刻蜡板和印刷，然后送发行所分发出去。父亲是个青年，身上带着大批秘密文件，通过敌伪警深密布的大街小巷是很危险的，父亲送了几次，每次回来，同志们都为他捏了把汗。我奶奶知道后，就要求由她来送这些稿件，理由是她是一个老太婆，不易惹敌人怀疑；即使被搜查出，她可以说是在地上拾到的，自己不认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她的请求，经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后来奶奶不但安全地完成了所有任务，她还一个个走访印刷所同志的家属，鼓励她们帮助爱人担负起秘密工作。老太太到同志家去串门，不易被左邻右舍注意，有时她在路上也遇到军警搜查，由于她神色泰然，也总是化险为夷，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日本帝国主义为对付抗日力量，在城市里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面对这个形势，省委任命父亲为省委秘书长，并为了安全，决定父亲家不再做省委机关，为此父亲又搬了家。党派一位从杭州来的张同志同他单线联系，后来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这位张同志被敌人抓去，他英里不屈，没有向敌人透露父亲的地址和组织关系，保护了父亲。张同志牺牲后，父亲便和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独立作战，和一度有组织关系的金剑啸及罗峰、舒群、肖军、肖红等一起活动，给报刊写稿，做宣传工作。1935年春，父亲与基督教牧师张海云的妹妹张安英结婚，使父亲又可以用基督教来做掩护，妈妈受父亲影响，也加入了革命斗争的行列，出生入死几十年。

1936年，父亲和金剑啸同志接办了日本人主办的《大北新报》的《大北画刊》，用迂回曲折的笔法发表抗日文章，一次因为发表了苏联文豪高尔基病重的消息，父亲和金剑啸等八人被日本特务逮捕，后来金剑啸同志英勇就义，他没有供出和父亲的关系，父亲也没有暴露身份，经奶奶想了许多办法营救，又有张海云牧师等人担保，父亲终于被保释出狱。但由于父亲的一切口供都是假的，时间一长肯定会被狱人识破而被重新逮捕，全家和有关同志商量后，父亲决定立即离开东北，奶奶把24岁的父亲送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转移上海

父亲一到上海，就进入了专门放映苏联电影的上海大戏院和专门经营苏联影片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负责翻译

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和影片中的对白。每有新片，他就给报纸写宣传稿。由于这项工作，使父亲能经常观看苏联影片和其他影片，把视野又扩大到这个艺术领域里。三十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艺运动蓬勃开展，父亲在这里认识了许多进步的文化战士和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1936年10月10日，鲁迅先生同夫人许广平和儿子海婴到上海大戏院观看叫《Dubrovsky》的苏联电影，它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中文译名《复仇艳遇》。父亲指着为这次放映而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小册子对鲁迅先生说，这本小册子对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叙述，都是根据鲁迅先生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编辑成的，并告诉鲁迅先生，这部影片的翻译名称，因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官的一再挑剔才改成了这样的片名。鲁迅先生愤慨地说：“检查官就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作品”。父亲还送给鲁迅先生二张赠券，请他下次来看电影。想不到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那时的上海，广大进步群众，特别是革命文学艺术界的人士，莫不以观看苏联影片为难得的学习机会，为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每放映一部新影片，他们都冒着危险到处于偏僻地区的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的上海大戏院观看苏联电影。父亲热情地接待他们，请他们开座谈会评论苏联影片，并招待记者，请他们为苏联电影做宣传。与此同时，父亲还翻译了不少文艺作品。如左琴科的话剧《结婚》，苏联《祖国进行曲》歌词，由吕骥同志配歌，单张发行；同王季愚同志合译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他们二人工作实在太忙，各自只译了几万字就停笔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租界周围地区，上海成为